**德國的歐盟政策：變遷與承擔**

**鍾志明**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本文為初稿，請勿引用)

**前言**

背負著過往破壞民主制度以及發動侵略戰爭的包袱，德意志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於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一向秉持堅守西方陣營、推動歐洲統合與國際多邊合作的原則。所謂的「波昂共和國」（Bonner Republik），指的就是冷戰時期以萊茵河中小型城市波昂為首都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是一個不具全球政治企圖、在對外關係上採合作與貿易利益為取向的非軍事強權（Zivilmacht）[[1]](#footnote-1)。自1990年兩德統一之後，上述基本外交路線雖然未有更動，但是柏林的信心明顯增加，獨立自主性也獲得強化。直到梅克爾強勢主導歐元債務危機之處理、以及西方因烏克蘭戰爭對俄羅斯之經濟制裁，今日的德國甚至被譽為西方民主的標竿與自由價值的捍衛者[[2]](#footnote-2)。本文認為，德國有實力、也有意願承擔責任和義務，共同與法國再度領導歐盟克服目前的危機，並引領歐洲國家面對全球化時代的挑戰。

**一、波昂政府歐洲政策的基石**

位處中歐，介於斯堪地那維亞半島與地中海、以及東西歐的分界，德國成為歐洲人員、貨物、資訊、觀念和各民族習性的自然匯集處。[[3]](#footnote-3)不過，在冷戰時期，歐洲被一分為二，而將西德整合進西歐與西方陣營，是二戰結束後波昂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國策。不僅是為了重新獲得完整的主權，更為了追求國家的安定、繁榮和未來的統一。德國為實現歐洲和平的目標，最關鍵的策略和作法就是法德和解，友善的和法國密切合作，形成「法德軸心」，聯手推動歐洲統合。德國透過歐洲共同體的平台，消弭鄰國的疑慮與恐懼。迄今，歐洲統合對德國仍具有多重意義，如：鞏固德國統一的結果、促進德國經濟的繁榮發展，保障德國安全和提高德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等。德國積極推動歐盟的擴展與深化，這對加強德國和東、西歐各國，有現實和戰略的雙重意義。德國從兩次世界大戰之中得到教訓，須與歐洲共存共榮。唯有推動西歐聯合，才能擺脫戰後孤立、政治侏儒的形象以及被佔領的束縛狀態。統一後的德國國家利益與歐盟的發展越來越緊密，一方面將德法關係與歐盟做連結，另一方面也與其他小成員國保持緊密的聯繫。因此，過去歐盟內部許多決策障礙，往往在關鍵時刻，都是藉由德國的妥協和不懈的努力才成功化解的。

1990年代初，正因德國與歐洲共同體的緊密結合，同時願意進一步推動貨幣聯盟，而緩解了西歐盟邦(尤其是法國)對統一後強大德國的擔憂，也或許是歐體/歐盟的非軍事特性與非霸權結構，使得當時的蘇聯也放下戒心。[[4]](#footnote-4)歐洲統合被視為一種保障和平、富裕和安全的合適框架，德國一直致力於加強歐洲的行動能力，包括加強共同外交、安全與防禦政策，這部分在里斯本條約通過後得以貫徹，德國為里斯本條約奠定了基礎，並取得了所有歐盟成員國的認同，在決策能力、政策制定和機構等重要問題上加強歐盟的作用。

**二、重回歐陸中心的柏林**

基於過往歷史和兩次世界大戰的原罪，德國在歐洲與外交政策上，採取政經統合路徑達到與鄰國和解的目標，以及立基於西方民主制度下的非軍事強權與經貿大國的自我定位。在美國與北約盟國的合作架構下，西德倚靠強大工業基礎支撐，聯邦軍隊始終維持相當水準的戰備力量，但是對於海外派兵或是歐洲共同安全與防衛政策的發展上，則顯得多所顧忌。

冷戰結束後，柯爾總理未事先與盟邦諮商便提出「十點統一計畫」（Zehn-Punkte-Programm），使得布魯塞爾上空瀰漫一股疑惑與焦躁不安的氣氛，不知統一後的德國是否依然願意當歐洲統合的主要推手。對其他歐洲國家來說，「歐洲的德國」還是「德國的歐洲」，是歐洲各國依然存在著憂心德國關鍵性強權地位的寫照。後來的行動與事實證明盟邦多慮了，德國政府信守對歐洲的承諾，只是今後的目標已不再是重獲主權或國家統一，而是結束歐洲的分裂，完成全歐的統一。對德國而言，此同時也意味著與波蘭的和解、打開新市場以及穩定中東歐的局勢。[[5]](#footnote-5)統一後德國曾經多次表明，要積極參與建立冷戰後國際新秩序的工作，為德國和歐洲走向世界開闢道路，建立國際上新的地位。因此從柯爾時代開始，德國便與周邊各國積極建立睦鄰友好關係、與東歐國家簽訂雙邊條約，而且一再地呼籲、強調維護歐洲和平的重要。尤其二十一世紀以來，整個德意志民族生命似乎進行了世代交替，上個世代仍普遍可見的拘謹、內斂個性，如今新世代正學著拋開罪孽情結之束縛，主張德意志民族已經是一個正常的民族。

早年「歐洲合眾國」曾經在西歐和西德喊得震天價響，但是1990年代初以來，尤其是聯邦憲法法院針對馬斯垂克條約的判決以及將歐盟界定為國家聯盟(Staatenverbund)之後，人們漸漸不再將它視為一個可以追求和實現的目標。不過，超國家統合(政策共同體化)與以聯邦原則(德國各邦)來建構歐洲，則仍是德國各界菁英所接受的共識。德國政府在歷次召開的政府間會議上，對於諸多體制改革與政策調整，皆能秉持和貫徹超國家統合這個指導原則，因此歐盟機構持續被賦予更大的權責，理事會多數決也逐漸增加，各國政策的歐洲化越來越深入、越來越擴大。

戰後德國外交政策主軸為：國際合作、多邊主義與歐洲統合，主張加強聯合國作用，強調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反對強權政治和單邊主義。統一後的德國並沒有因為自己經濟實力增強、在歐洲的地位提昇而改變外交政策的方向。德國與歐盟的關係是德國政策中重要的一環，也是優先處理的課題。德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3仰賴出口，其中60%是與歐盟各國的貿易，每4個就業人口當中，就有一個與出口有關。因此，德國特別依賴與歐盟的良好關係以及一個穩定的內部市場。由於統一後繼承了前東德鉅大債務，造成德國經濟重創、財政赤字嚴重。為重建德東地區，德國須擴展公共支出，且為防止通貨膨脹更加惡化，而使利率居高不下，也因而帶動整個歐體處於高利率的情況。有鑑於此，德國希望經濟貨幣聯盟的建立，可以避免貨幣之浮動與不穩定、消除匯兌損失。

歐體於1991年底通過馬斯垂克條約，決定經濟貨幣聯盟及政治聯盟草案。貨幣聯盟為德國強力主導的結果，決定放棄馬克，邁向歐元。德國堅持設立非常嚴格的加入門檻，1995年又提出《穩定與成長公約》，嚴格要求加入歐元區後，每個會員國必須遵守財政紀律。除此之外，德國之所以願意推動貨幣聯盟，考慮的不僅是德國本身的利益，同時也欲化解德國關鍵性強權地位的疑慮，著眼於歐盟長遠的發展與和平。歐洲經濟統合也的確帶動了穩定、富裕的社會發展，不論是共同貿易政策還是內部市場的建立，德國都是主要的獲益者，因此全力推動並努力維持經濟與貨幣的整合。實證研究顯示，從1992年到2012年，歐洲內部市場使得德國國內生產毛額每年額外增加了370億歐元，每個德國人的年均收入則是增加了450歐元。[[6]](#footnote-6)在貨幣聯盟方面，德國遵循市場、競爭與貨幣秩序的基本法則，具體落實在一個獨立的公平競爭監管單位（執委會）、確保物價平穩且獨立的歐洲中央銀行、以及會員國的責任與義務。

**三、聯盟方法與承擔**

2012年2月基民黨、基社黨與自民黨的聯合政府提出一份對外關係的基礎文件「塑造全球化，擴大夥伴關係，分擔責任—德國政府的構想」[[7]](#footnote-7)，指出國際社會秩序呈現多極化，不少經濟快速發展的新興國家（例如中國和印度），不僅對所處區域的合作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也在國際決策過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是參與塑造全球政治的新力量，即「型塑世界的力量」（Gestaltungsmacht, formative power；中譯「新興力量」）[[8]](#footnote-8)，而德國也自許為其中的一份子。這個用詞包含著權力的概念，但卻與強權有所區別，也揮別非軍事力量的隱喻。[[9]](#footnote-9)

2013年12月史坦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回任德國外長時宣布，外交部將與社會進行公開對話，共同思考德國外交政策的前景，包括目標、利益、挑戰和工具。緊接著在2014年1月的第5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上，德國總統高克（Joachim Gauck）[[10]](#footnote-10)、外長史坦邁爾與國防部長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相繼談到德國應「更早、更堅定以及更實質」（früher, entschiedener und substanzieller）參與國際事務，並肩負起更多的國際責任。這個帶有自我新定位與角色新認知的「慕尼黑共識」（Münchner Konsens）[[11]](#footnote-11)，可謂德國「告別波昂」的關鍵分水嶺[[12]](#footnote-12)。隨後，在一連串的危機背景下─如烏克蘭衝突、伊斯蘭國（ISIS）坐大、地中海難民潮、以及尚未完全終結的歐元（Euro）債務危機等，2014年德國的外交政策進入「檢視進程」（Review-Prozess），外交部著手檢討組織調整，國防部則研擬新版國防白皮書。同時，學界與媒體也熱烈討論德國外交新政策，特別是柏林處理歐元和難民議題的強勢及其引發的爭議，使得德國應該在歐洲扮演什麼角色，更引起各方關注與辯論。[[13]](#footnote-13)

2014年2月由德國外交部所規畫主導、以「檢視2014─外交政策的深度構思」（Review 2014 - Außenpolitik Weiter Denken）為標竿的外交政策總體檢，前後長達12個月，超過60場公開聽證會或研討會，除了在德國境內各城市巡迴舉辦，也在歐洲重要友邦的首都如巴黎、倫敦、布魯塞爾、華沙等地進行，更邀請國內外的學者專家、媒體與公民社會共同參與，以廣納建言。在2015年2月25日於柏林所召開的最後一次會議「危機、秩序、歐洲─檢視進程之結論」（Krise, Ordnung, Europa - Schlussfolgerungen aus dem Review-Prozess）上，外長史坦邁爾總結說道：「世界局勢已經改變，德國外交部也必須跟著改變」[[14]](#footnote-14)。有關歐洲部分，許多來自各國的專家都認為，德國居於歐洲的領導地位（Führungsmacht），應該擴大歐洲範式在處理全球事務上的適用性。史坦邁爾強調，未來不論是在人事、結構還是理念上，德國外交政策和外交部所有部門都要更加體現歐洲元素。[[15]](#footnote-15)

德國國防部則於2016年7月13日發佈「2016白皮書—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安全政策與聯邦軍隊之未來」（*Weißbuch 2016 zur Sicherheits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zur Zukunft der Bundeswehr*，以下簡稱白皮書）[[16]](#footnote-16)，清楚表達德國將擺脫二戰後外交與軍事「自我節制」（Zurückhaltung）[[17]](#footnote-17)的基調、以及「越來越被視為歐洲的核心角色（zentraler Akteur）」，柏林有責任、也有義務積極參與塑造歐洲和全球秩序。[[18]](#footnote-18)就在白皮書正式發表的前一週，內閣通過了2017年國家總預算和2020年中期財政預算計畫，國防經費提高17億歐元，達366億歐元。儘管聯邦支出增加，但未來幾年仍將朝新增財政赤字零成長目標前進，到2020年德國國債佔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控制在60%之內，符合歐盟「穩定與成長公約」（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的規定。[[19]](#footnote-19)這凸顯政府對德國經濟發展榮景的信心，以及勇於承擔責任、發揮主導作用的決心，彰顯德國在國際上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2010年11月在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的演講中，梅克爾認為應該找到一個跨越「共同體方法」(Gemeinschaftsmethode)與「政府間方法」(intergouvernementale Methode)二元對立的概念，她提出新版的「聯盟方法」(Unionsmethode; Union Method)來處理歐盟日常或應付危機[[20]](#footnote-20)。她的「聯盟方法」指的是：會員國與歐盟機關一起制定共同的目標與策略，然後依各自的權限採取行動，是分進合擊，目的不在於取代超國家的歐盟機制。儘管兩周後基督教民主黨（CDU）在萊比錫黨大會上所通過的決議文件（Starkes Europa – Gute Zukunft für Deutschland），仍然明白強調其歐洲政策基本上建立在共同體方法之上，[[21]](#footnote-21)但從梅克爾角度來看，兩者並不衝突。

聯盟方法鼓勵所有會員國政府與議會積極採取必要措施，與歐盟機構聯手解決歐洲所面對的治理問題。這是希望會員國能擔負更多責任、做出更大貢獻，同時卻也給予有能力和作為的會員國更大空間來帶領歐洲統合前進。不過，此一「方法」卻也帶來聯邦政府與執委會的體制扞格，以及歐盟高峰會的地位和決議凌駕於執委會之上。[[22]](#footnote-22)換句話說，不僅埋下會員國利益高於歐盟整體利益的衝突引信，同時也進一步強化政府間合作的正當性，或是給予「多速歐洲」更多運作空間。即便梅克爾所提的「聯盟方法」早有許多前例如申根協定、社會政策議定書和基本權利憲章、貨幣聯盟與財政穩定條約[[23]](#footnote-23)，都是先在歐體歐盟體制外運作，然後才納入條約體系，這些都已是實踐出來的事實，然而基於以上可能發生的弊端，因此特別需要德國（與法國）出來承擔領導歐盟整合或引導會員國合作的責任。2011年底法國前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在Toulon的演說中也提到：「歐洲的改革並非往超國家性前進（...）歐洲的整合將以政府間的方式進行，因為歐洲需要做策略性的政治選擇」。[[24]](#footnote-24)

1970年代Tindemans報告中首度引入「分段統合」的概念，至遲到了90年代中期德國基民黨與學者們分別提出「核心歐洲」或是「彈性統合」的想法，歐盟便已在條約內預留空間（強化合作），讓有意願加深統合的會員國可以彼此先行合作，形成所謂的先鋒部隊（Avantgarde）。然而，不論是何種名詞或概念，都是以促進統合前進為目標的手段，而不是要將歐盟超國家統合降格為主權國家間的合作。政府間路徑有利於大國，因為相對於超國家路徑來說，其權力和影響力比較大。但是，也不能完全忽略的是，在特定歐盟政策領域（如歐元區的危機管理），政府間的解決方式比較容易贏得輿論支持，或是在共同安全防衛政策上可以賦予直接的正當性，因為必須由聯邦政府和議會來拍板定案。話說回來，政府間方法也有其缺點，尤其是~~取得共識決的曠日廢時~~或是各國執行效率不一等問題；另外，德國的歐洲政策一向偏好共同體方法，不僅具體落實在歷次條約的改革中，對其他會員國而言也比較不會心生德國獨霸歐洲的憂慮。[[25]](#footnote-25)

**結語**

無論是其國土大小、人口數量和品質或是整體的經濟實力，德國都是歐盟會員國中的「超強」。歐盟任何一重要政策之推動或內部改革，若無德國之支持，實在很難進行。1990/91年冷戰結束，提供了德國統一的契機，使得德國的地位獲得提昇，德國注定要成為歐洲的大國與強國。德國主導處理歐債危機的能力與結果普獲肯定，也讓柏林的信心大增。隔年底梅克爾展開第三任總理任期，2014年初的「慕尼黑共識」標誌著德國自我新定位與角色新認知，隨後便深入檢視外交與安全形勢，清楚表達柏林有責任、也有義務積極參與塑造歐洲和全球秩序。2015年秋天梅克爾以人道為由幫助難民，要做出這個政府決定絕非輕鬆，或有基於補充德國勞動力的考量，但是勇於承擔責任、發揮主導作用，展現德國積極參與塑造歐洲與國際秩序的能力，才是梅克爾擁抱敘利亞難民的真正動機。

在未來歐洲統合的過程中，德國仍將持續與法國扮演火車頭的角色。以歐盟為平台，德國不斷往前及向上發展，國際政經地位的份量提升，亦有助歐洲在國際事務上自主能力的加強，這也回過頭來增強柏林的影響力，有如魚幫水、水幫魚。有人說：「歐盟發展史就是一部危機產生和解決的敘事史。歐洲統合的歷史證明，每一次危機都是一體化進程深化的契機。」總結來說，德國推動統合的主要動機，就是要在歐洲建立秩序、追求富強，而歐盟也正是德國內政的延伸─經濟上強大、政治上作為文明力量、軍事上則謹慎前進。

德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有很大一部分與德國在歐盟裡所扮演的角色相關，歐盟面對的諸多棘手―不管是歐債、脫歐還是難民―問題，都是德國想推都無法推掉的重擔，其他國家也期待德國能積極承擔領導的責任。下一屆聯合政府儘管對歐盟立法或措施容或有所調整，但柏林的親歐路線不會改變。不論這次聯邦議會大選是否為梅克爾時代終結的開端，歐洲的未來仍與梅克爾或其繼任者的歐盟政策息息相關。

\*\*\*

九月的聯邦議會大選結果，聯盟黨比投票前的民調預估還來得差，使得梅克爾內外的實力皆遭到削弱，不論是在黨內或是在未來內閣的威望，還要面對擁有近百席民粹右翼政黨的國會。倫敦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任Robin Niblett就認為：「梅克爾採取協調立場、扮演領導角色以及推動歐洲向前發展的空間已經縮小了。」[[26]](#footnote-26)

此次選舉中，梅克爾所在的保守派陣營只得到32.9%的票數，為1949年以來最低，而新選擇黨勢頭見漲，原因在於梅克爾在2015年允許數以十萬計的難民進入德國。並衝擊到CSU選票流失，支持者轉投新選擇黨。德國週日的大選中，傳統建制派政黨贏得超過73%的選票，極右翼的AfD得票率為12.6%。過去十年中，德國和梅克爾一直充當著歐洲穩定支柱的角色。前世界貿易組織秘書長拉米（Pascal Lamy）也指出：「從歐洲角度來說，此次德國大選是個雙重打擊，一方面，以往穩定模範的梅克爾政治地位被削弱；而另一方面，反歐洲的力量得到增強。」[[27]](#footnote-27)

1. Wilfried von Bewdow, *Die Auß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ine Einführung*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6), p. 149. [↑](#footnote-ref-1)
2. Carol Giacomo, “When Obama's Gone, Who Will Stand Up for Democracy?”, *New York Times*, 2016.11.17, http://www.nytimes.com/2016/11/17/opinion/when-obamas-gone-who-will-stand-up-for-democracy.html; Alison Smale, “Angela Merkel to Seek 4th Term as Germany's Leader”, *New York Times*, 2016.11.20, http://www.nytimes.com/2016/11/21/world/europe/angela-merkel-germany.html.. [↑](#footnote-ref-2)
3. Ulrich Speck, “Power and Purpose: German Foreign Policy at a Crossroads” (Brussels: Carnegie Europe), 2014.11.3, http://carnegieeurope.eu/2014/11/03/power-and-purpose-german-foreign-policy-at-crossroads-pub-57167. [↑](#footnote-ref-3)
4. Katrin Böttger and Mathias Jopp, "Grundlinien deutscher Europapolitik", in Katrin Böttger and Mathias Jopp (eds.), *Handbuch zur deutschen Europapolitik*. Nomos, 2016, pp. 18. [↑](#footnote-ref-4)
5. Böttger/Jopp (2016): 19. [↑](#footnote-ref-5)
6. Bertelsmann Stiftung, *20 Jahre Binnenmarkt - Wachstumseffekte der zunehmenden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Gütersloh, 2014. pp. 27, 30. [↑](#footnote-ref-6)
7. Auswärtiges Amt, *Globalisierung gestalten – Partnerschaften ausbauen – Verantwortung teilen*. Berlin, 2012,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cae/servlet/contentblob/608384/publicationFile/169965/Gestaltungsmaechtekonzept.pdf. [↑](#footnote-ref-7)
8. *Ibid*., p. 5. [↑](#footnote-ref-8)
9. Gunther Hellmann, “Zwischen Gestaltungsmacht und Hegemoniefalle. Zur neuesten Debatte über eine 'neu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Vol. 66. No. 28-29, 2016.7.11, p. 7. [↑](#footnote-ref-9)
10. Joachim Gauck, “Deutschlands Rolle in der Welt: Anmerkungen zu Verantwortung, Normen und Bündnissen,” Rede zur Eröffnung der 50.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2014.1.31, http://www.bundespraesident.de/SharedDocs/Reden/DE/Joachim-Gauck/Reden/2014/01/140131-Muenchner-Sicherheitskonferenz.html. [↑](#footnote-ref-10)
11. Carsten Breuer and Christoph Schwarz, “Meilenstein, kein Endpunkt. Das Weißbuch als strategische Weichenstellung für deutsche Sicherheitspolitik,” *Internationale Politik*, September/Oktober 2016, p. 84. [↑](#footnote-ref-11)
12. Gunther Hellmann, “Im offensiven Mittelfeld: Deutschlands neue Spielmacherrolle in der europäischen Politik,” *Zeitschrift für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Sonderheft 6, 2015, p. 474. [↑](#footnote-ref-12)
13. Anne-Sophie Friedel, “Editorial”,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Vol. 66. No. 28-29, 2016.7.11, p. 3; Auswärtiges Amt, “Review 2014. Motivation und Hintergrund”, 2015.2.25,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Amt/Review2014/Motivation/Text\_node.html. [↑](#footnote-ref-13)
14. Auswärtiges Amt, “Review 2014 – Die Schlussfolgerungen”, 2015.5.25,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Amt/Review2014/Ueberblick/Text\_node.html. [↑](#footnote-ref-14)
15. *Ibid*. [↑](#footnote-ref-15)
16.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Weißbuch 2016 zur Sicherheits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zur Zukunft der Bundeswehr*. Berlin, Juni 2016. [↑](#footnote-ref-16)
17. Gunther Hellmann, “Deutschland in Europa: Eine symbiotische Beziehung”,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Vol. 52, No. 48, 2002, p. 24. [↑](#footnote-ref-17)
18. *2016 Weißbuch*, p. 22. [↑](#footnote-ref-18)
19. 聯邦議會排定於9月至11月審議總預算案。麥可欣，〈德內閣通過2017年財政預算草案〉，《聯合早報》，2016.7.7，http://www.zaobao.com.sg/realtime/world/story20160707-638315. [↑](#footnote-ref-19)
20. "Rede von Bundeskanzlerin Merkel anlässlich der Eröffnung des 61. akademischen Jahres des Europakollegs Brügge", 2010.11.2, https://www.coleurope.eu/system/files\_force/speech-files/rede\_merkel\_europakolleg\_bruegge.pdf, pp.5-9. [↑](#footnote-ref-20)
21. 24. Parteitag der CDU Deutschlands, 2011.11.13-15, http://www.leipzig2011.cdu.de/images/stories/docs/1111114-beschluss-europa.pdf, p. 16. [↑](#footnote-ref-21)
22. Roland Sturm, "Die Europäisierung des deutschen Regierungssystems", in Katrin Böttger and Mathias Jopp (eds.), *Handbuch zur deutschen Europapolitik* (Nomos, 2016), p. 64. [↑](#footnote-ref-22)
23. 五年內應將條約內容納入歐盟既有條約。 [↑](#footnote-ref-23)
24. Christian Lequesne, "The Eurozone crisi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new intergovernmentalism' as a valid theory", in Sabine Saurugger and Fabien Terpan (eds.), *Crisi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54. [↑](#footnote-ref-24)
25. Böttger/Jopp (2016), p. 17. [↑](#footnote-ref-25)
26. Noah Barkin, “The new risk for Europe: an inward-looking Germany”, *Reuters*, 2017.9.26,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germany-politics-europe-analysis/idUSKCN1C1205. [↑](#footnote-ref-26)
27. Barkin, *op. cit*. [↑](#footnote-ref-27)